



不可捉摸的卡洛斯

(英)克·多布森 罗·佩恩著

群众出版社

不可捉摸的卡洛斯

〔英〕克·多布森 罗·佩恩 著

王明元 杨开山 译 群益 校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六·北京

050417

Christopher Dobson et Ronald Payne

CARLOS

L'INSAISSABLE

本书根据Albin Michel出版社1977年版译出

不可捉摸的卡洛斯

〔英〕克·多布森 罗·佩恩 著

王明元 杨开山 译 群益 校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11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246 定价：2.00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恐怖活动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各类恐怖组织名目芜杂，遍地丛生。频繁的空中劫持、抢占使馆、绑架暗杀事件等等引起国际公众的严重不安和极大关切。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涉足探讨这一令人瞩目的问题。而本书作者多布森和佩恩即属此列。他们通过查阅大量档案，进行无数次的采访，其中包括利比亚国家元首卡扎菲、一些事件的人质和被捕的恐怖分子等，从而采撷了丰富翔实的素材，二人经过数年的通力合作，于一九七七年完成此著。

本书题目《不可捉摸的卡洛斯》，乍看起来，颇象一部个人传奇。其实，作者只不过是把这个罪恶昭彰的恐怖分子作为向导，让他带领读者去探索一座布满神秘色彩的迷宫。但正如作者所说，他们不只是着眼和满足于把本书写成一部“情节奇险、震惊人心的作品”，或者仅仅披露一些至今“尚未为世人所知的”内幕新闻。他们希冀的是，通过本书能对当今世界所出现的这一令人不安的社会现象，作一彻底的剖析。

但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在理论阐述、人物褒贬等方面，必然有谬误之处。比如，混淆了革命的武装斗争和恐怖活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战斗组织和恐怖主义团体之间的界线；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偏袒以色列一方，凡此等等，

希望读者在阅读中注意加以鉴别。

尽管如此，由于本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对于我们了解当今国际上恐怖活动情况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由于水平所限，错误和疏漏难以避免，敬请读者指正。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承蒙陈汉生同志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不吝赐教，在此特表谢意。

译 者

一九八四、八、二十二

目 录

序 言	(1)
第 一 章 恐怖主义和戏剧	(11)
第 二 章 奥运会后的猎杀	(23)
第 三 章 卡洛斯登上舞台	(31)
第 四 章 巴黎的冷枪	(51)
第 五 章 杜里埃大街的惨剧	(72)
第 六 章 逃往阿尔及尔	(81)
第 七 章 奇特的人和更为奇特的现象	(96)
第 八 章 亚玛尼酋长的叙述	(110)
第 九 章 圣诞节绑架人质	(126)
第 十 章 银行主	(154)
第十一章 德国恐怖主义组织网	(179)
第十二章 日本“赤军”	(209)
第十三章 袭击恩德培机场	(238)
第十四章 恐怖主义的由来	(264)
第十五章 怎么办?	(292)

序 言

七十年代初期，国际恐怖主义作为一股必须认真对待的势力和严重的时代疾病，崛然而起，蔓延于世。每当史学家们回顾这一时期时，都会对一个年轻的委内瑞拉人那副略显虚胖的面庞，葆有极其强烈的印象。此人名叫依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而更广为人知的大名是“杀人暴徒卡洛斯”。卡洛斯时而用炸弹或冲锋枪，时而用暗杀或绑架，攫住了公众的注意力。尽管人们对此人满怀恐惧，但仍被他那“赫赫战绩”所吸引。他杀人如割草芥，亵渎无视当代文明的种种道德准则，常在女人行里混迹，且总是独占花魁，这一切都是他具有诱人魅力之所在。当然与此同时，大家也都知道，惩处他的日子日渐到来，卡洛斯最终必然以暴卒而了其一生。

卡洛斯成了电视屏幕上的红人，成了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反面英雄”^①在现实生活中的化身，成了世界明星。卡洛斯身边簇拥着德国“巴德尔集团”、日本“赤军”以及巴勒斯坦一些组织中的狂热的追随者，他已经取代了美国强盗在世界神话中的位置。巴勒斯坦的重要领导人乌阿迪·哈达德负责安排他在各地的活动，而他的暗中合伙人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则把用石油换来的金钱供他大量使用。

① 即指现代文学作品中毫无传统性主人公特点的人物。——译者注

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有必要成为本书的主人公。不过，我们认为，卡洛斯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上述这种不甚难得的名声，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象征，并让世人了解到，当今，一个由果敢的革命者们建立起的组织网已经遍布全球。这些革命者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都决心要摧毁现代的社会结构。此外，卡洛斯的重要性还在于，他乃是这个组织网的核心人物。根据上述种种理由，我们决定在本书中把卡洛斯作为一个“向导”，进而来探索由世界恐怖主义者建造的这座布满神秘色彩的迷宫。这是一次扣人心弦的旅行，它使我们沿着纷杂阴晦的曲曲小径艰难而行，它使我们在途中同一些具有非凡性格的男男女女相遇，而且乍一看来，他们根本不象是一些献身于恐怖活动的人。这个组织网有自己的“凶手”，有各种组织的支持，有许多精神上的同情者。它延伸遥远，分布广泛。在旅途中的每一个转弯抹角处，都要暴露出几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件。而且，凡是这次探险所经之处，我们都会同别有用心、克格勃人士的足迹交错而行，因为克里姆林宫即使不直接介入，但也极力想了解在这个国际革命的秘密世界里发生的事情。

作为新闻记者，我们早已开始关注恐怖主义活动。事实上，我们两人对此已经研究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爆发的一切战争。早在二十年前，佩恩一直注视着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进程及其在法国导致的后果；多布森则探讨分析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巴蒂斯塔的斗争。自那时起，我们积累了大量有关各种革命组织和它们所采用的斗争手段的调查材料。塞浦路斯全国战士联合会，以色列的“依尔贡·茨维·鲁米”，越共，“黑九月”……所有这些组织的情况都相继载入我们

的笔记本中。一九七五年，巴黎杜里埃大街发生四人被杀的凶杀事件后，《星期日电讯报》约我们写一篇有关卡洛斯的报道，紧接着，警方发现卡洛斯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首领。这两件事促使我们想到：我们手头已经掌握写这本书的基本素材，只不过需要把这些资料加以分类整理，弄清哪些我们已经掌握，哪些尚待进一步探索和查证。

接着，我们进行了近一年的调查研究。幸运的是，在这次调查过程中，《星期日电讯报》同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佩恩对卡扎菲进行了一次轰动一时的采访，多布森完成了对袭击恩德培机场事件的全面调查研究。我们充分利用了原先在中东两个阵营中建立的各种友谊联系，他们有的是外交官，有的属于秘密情报机关。任何一个新闻记者采访旅途中都要与他们打交道。我们同很多人进行了交谈。当然，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这里还是不提及他们的名字为好。在采访过程中，同往常一样，既有好运气，也有坏遭遇。有些我们追踪的线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另外一些线索却把我们引进了情报之花争芳吐艳的境地。

比如，一开始我们就时时预感到，卡洛斯和英国的变节者乔治·布莱克之间有某种联系，后者虽被判处四十二年徒刑，却逃往莫斯科并在那里定居了。我们碰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发现，那个在维也纳绑架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部长事件中受伤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约阿希姆·克莱茵，曾经给让·保罗·萨特开过汽车。

再如，我们获悉，在恩德培机场被以色列人击毙的恐怖分子中，有两名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称“人阵”）的重要成员。这两人不只是年轻的枪手，还是负责“人阵”同

日本和南美革命者之间联络的“外交官”。此外，我们也了解到，卡洛斯是如何学会得心应手地去诱惑纯真无邪的年轻女人，从而进一步使她们成为自己的掩护体。

我们的调查如同遍地探宝，而要寻找的奇珍异宝就是那些神秘莫测的事实。当然，对于采掘来的材料，我们必须加以挑选、提炼，以汲取较为具体的并且有共性价值的东西。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一些象卡洛斯那样出身于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前程无量的年轻人，是怎样抛弃自己原先所笃信仰慕的一切，继而转向热衷于凶杀和暴力的。一些宣称酷爱和平、醉心于改造世界的青年们，怎样会居然选择最野蛮的暴力来作为自己的行动手段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在本书一开头就加以说明，是十分必要的。

要搞清这一现象，我们必须追溯到一九四五年，追溯到战后人们对和平产生的极端失望情绪。因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累累暴行之后，战后的和平局面没能带来人们强烈渴求的正义和安宁。

一九四五年后的世界政治为两个主要因素所左右：一是旧殖民主义王朝的解体和崩溃；二是存在着两个超级大国相持的角逐局面，它们互相间都受到被核战争摧毁的威胁，但谁也不可能战胜对方。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并不意味着和平。俄国和美国把左的或右的革命运动作为自己的代理势力，唆使它们互相格斗，而这两个超级大国却谁也不敢公开参与。从前在旧殖民帝国统治时期轻而易举镇压下去的叛乱，如今成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原来的欧洲殖民大国被五年战乱搞得财竭力衰，早已无力再有效地使用传统的镇压

手段。与此同时，那些革命者却经常地获得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于是，洪水猛兽般的暴力潮流滚动翻腾起来。肯尼亚的“茅茅”运动，塞浦路斯全国战士联合会，马来西亚的共产党人都转向了恐怖主义活动，成功地运用着大战期间学会的游击战术。后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同他的大胡子伙伴们一起，在古巴创立了新的革命宗教。这个革命宗教的伟大传教士切·格瓦拉，将向全世界的青年布道，以传播这一新的信仰。

但是，把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变成恐怖主义者的真正催化剂是越南。发生在那里的长期战争首先推翻了法国旧殖民王朝，后来又赶走了美国新殖民主义暴君。肆虐折磨和恐怖活动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举。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为了打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采用过他们在印度支那学来的那套战术。继法国之后，美国人在越南又重施法国人那套故伎。这种局面只能使法国和美国军队中新招收的年轻的士兵感到厌恶和丢脸。与此同时，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西方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即著名的“新一代”，越来越对受殖民主义剥削的第三世界各国持同情态度。法国的左派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美国人民反对越南战争的情绪越来越高昂，它对制止战争死亡人数的增加，对进一步确立战争不可能获胜的信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一旦这种反战情绪公开爆发，它就会对一个在此之前始终相当自信的国家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在世界各地，新一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观念，开始倾向于一种不十分明确、非典型的共产主义学说，如托洛茨基主义，甚至有的还倾向于“人民之花”和对一切

义务职责都持反对态度的嬉皮士所奉行的更混沌朦胧、模糊不清的理论。

这些活动家们一心要改造他们已经不再崇信的西方社会。在他们的眼里，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两股邪恶势力，是狼狈为奸的孪生兄弟，议会民主则是肆虐的统治者雇来干杂活的女婢。他们寻求别的道路，以图实现他们那恍惚迷离、乌托邦式的理想。这些新左派大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在六十年代中期，受到过高尚的以仁慈为怀的愿望的熏陶；应当帮助国内的贫苦民众和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人民。

上述观念并未仅仅局限在西方世界，它也蔓延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征服了整个东欧的青年一代。

一九六八年在巴黎爆发了大学生革命运动，这场革命很快成为戴高乐将军下台的标志。这场革命的鼓吹者是赫伯特·马居斯、雷吉斯·德布雷和弗朗兹·法农；这场革命的主角是切·格瓦拉、丹尼尔·科恩·班迪特和赤色分子鲁迪。这场革命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成果之一就是：大学生们发现自己有能力向现存的权力发动攻击。在他们看来，压迫者与当局同属一个阵营，用革命的暴力去回答国家的暴力是天经地义之举。

两年后发生的又一起事件，大概使美国的大学生们更加坚定地确认了这一信念。在美国俄亥俄州国立肯特大学校园里，一些学生起来造反，反对尼克松总统入侵柬埔寨的决定。在未进行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向大学生们开枪射击，结果，打死四人，打伤十人。尼克松把这些学生们的伤亡，归咎于暴力行为导致的必然结果。当然，他指的暴力行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暴力行为。但是，在美国青年和

全世界青年的眼里，勿容置疑，这次事件是国家机器本身滥施暴力的一个绝妙的例证。

就这样，这些理想主义者，其中包括许多参加过印度支那和中东战争的人，几乎是糊里糊涂地再次被卷入了暴力活动。他们使用苏制冲锋枪、炸弹攻击和破坏他们极端仇视的一切。他们变成了“裤兜里藏着手枪”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些希冀把旧制度砸得粉碎，并力求建立一个连他们自己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概念的世界的人来说，革命和恐怖活动本身就是目的。他们声称，仅仅是破坏就足够了，从废墟中总会产生某些美好的事物。

在本书中，我们不打算谈及共产党大国的间谍和蛊惑者，尽管它们是那么急切地沉溺于分裂西方公众舆论，而对自己国内出现的同样不满情绪却缄口默言，毫不提及。至于以杀人为戏的心理变态者，我们不打算多说。我们要叙述的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即被卷进暴力漩涡的年轻的核裁军的宣传者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以及那些希望改造世界性情温和的人，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终于杀起人来。他们是恐怖主义分子中陷入绝望深渊之底的人，因而也最难对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理想已从指缝之间溜掉了，而残留在手上的只有斑斑血迹。在斯大林一手造成的震惊世界的冤案期间，一些共产党公开承认自己从来未犯过的罪行，因为拒绝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就意味着否认共产主义和他们自己的宇宙观。我们在书中谈到的绝望分子同这些共产党人十分相似。德国“巴德尔集团”的奠基人之一乌尔利克·迈因霍夫，正是此类人物中的典型一例。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开始其革命生涯，继而又从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化成恐怖主义

分子，后来，大概是由于对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感到种种怀疑，因而在受审期间自戕于狱中。

被恐怖分子引为行动口实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尽管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武器，但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们在浴血奋战。照新式派的说法，这场战争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场反对殖民主义的战争。在他们看来，以色列只不过是美国的造物，资本帝国主义的私生子。

但是，这场战斗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巴勒斯坦人手里有钱，有武器，有统一的组织和许多安全可靠的隐蔽地。他们不仅把打击以色列作为自己的使命，同时也包括美国。特别是“人阵”还允诺，要发动一场世界革命。一个年轻的活动家，怎么会不被这美好的事业所吸引呢？

于是各种各样的联系应运而生了。巴勒斯坦人需要外国革命者帮助自己顺利地开展恐怖活动，而被本国当局追逐缉捕的革命者则感到，同巴勒斯坦人在一起，在意识形态上融洽一致，在人身安全上万无一失。

在另一方面，莫斯科和哈瓦那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凶险、隐蔽的联系。克格勃早就在利用着混乱的局面，因为它总是力图从别国人民的不幸中捞取好处。在每一个巴勒斯坦组织内部，在每一个恐怖主义集团里，只要追本溯源，总会发现至少有那么一两个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人物。如果再加上恐怖主义分子所使用的武器大都来自这个国家的兵工厂这一事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偶合了。

在古巴，这条联系线的终端于一九六六年元月在哈瓦那建立。卡斯特罗的秘密警察机构——情报总局——早已在暗中为克格勃效劳，但卡斯特罗同俄国人如出一辙，极力想使

自己的情报机关在搞颠覆活动方面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因此，他召开了“第一届亚非拉人民团结大会”，即后来名噪一时的“三大洲会议”。古巴政府和古巴共产党接待了各地的客人。前来参加会议的共有八十二个国家的代表团，不言而喻，最为显赫、最为重要的代表团是由四十名成员组成的苏联代表团。

大会的语言全是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国家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加强各种形式的斗争……”大会的主题可简要概述于下列决议之中：“大会宣告，各国人民对完全的政治独立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为此，大会认为，应当采用一切必要的斗争手段，其中包括武装斗争，以夺得这个权利。”

这次大会建立了两个常设机构：一个是“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其宗旨是“联合、协调和指导三大洲的革命斗争”；另一个是大会之后，在违背俄国人的意愿的情况下成立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它由二十七个拉丁美洲的代表团组成，其目的是利用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支持解放运动。为什么俄国人表示反对呢？与其说是出于客观原因的考虑，不如说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俄国人总是宁愿同拉丁美洲正统的共产党合作，而不太愿意同与其说是共产主义的，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争取独立的游击运动合作。正如读者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这种局面对现代恐怖主义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三大洲会议”召开时，切·格瓦拉已经投身于玻利维亚那场冒险活动。这次冒险活动，不久就以他的死亡而告终。切·格瓦拉虽没有出席会议，但与会者仍一致推选他为

“名誉主席”。切·格瓦拉也发来贺电，呼吁创立“两三个或更多的越南”，用颠覆战争这根绞索置美国于死地。

“三大洲会议”，说穿了，只不过是—次对世界革命和恐怖活动进行协调的会议。其最具实效的成果之一是，在古巴的一些营地，由俄国和古巴教官对拉丁美洲青年进行正规化训练。在那里，教官们向受训者传授游击战和恐怖活动的战术，其中成绩优异的学员被派往莫斯科的卢蒙巴大学，进行更加完善的专业训练和思想灌输。

至此，我们就直接接触到卡洛斯了。本来，他是一个满脑子充溢着“三大洲会议”理想的拉丁美洲革命者。最初，他受训于古巴，继而转读于卢蒙巴大学；后来，他卷进了巴勒斯坦事务中，并由此获得了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显赫名声。乍看起来，他很象一个一般的由于绝望而跌入暴力深渊的年轻人，但是在他身上，有着某些有别于他人的东西。所有这一切向我们表明，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应归因于他的家庭环境和他同莫斯科若明若暗的联系，而且，正是这两点，才使他成为一个“精通于恐怖活动的大师”。这个称号乃是卡洛斯的父亲，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百万富翁，对自己儿子的赞美之词。

我们选择一九七二年夏天发生的慕尼黑惨案作为本书的开端。这一杀戮事件是巴勒斯坦人采取的一次行动，卡洛斯与此事件毫不相干。但读者不要就此而探寻我们有什么邪念。我们这样做只是由于，在当代恐怖主义活动史上，在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漫长征途中（恐怖主义往往围绕着这一事业而活动），慕尼黑事件乃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起点。

第一章

恐怖主义和戏剧

在慕尼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本应使德国同世界各国重新和睦相处。这也就是说，通过这次各国人民之间友好比赛和亲善情谊的盛会，抹去人们对一九三六年希特勒主持的那届奥运会的阴沉记忆。富有而自信的德国为接待来自整个世界的男女运动员，进行了精心的准备。遍布全世界的电视网将使全球都可以看到比赛的实况。这简直可以说是一场庆祝和解的盛典了。

然而一反人愿，整个世界却观看了一场登峰造极的暴力表演，目睹了八个阿拉伯青年杀死十一名以色列奥运会代表团成员，而且这八个阿拉伯人中也有五个一命归天。奥运会虽然继续举行了，但在这一事件的猛烈冲击下，全世界不得不确认，仇恨和残暴始终是人类本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一些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过去对此却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

这些阿拉伯青年——“黑九月”的成员——的目的实际上是很明确的，他们打算利用奥运会来震动一下世界舆论，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到巴勒斯坦事业上来。“兰特公司”负责研究分析恐怖主义的专家、美国国务院有关政治阴谋和暴力活动问题的顾问布赖恩·詹金斯认为：“恐怖活动的目的是观众，而不是受害者本人。恐怖主义乃是一幕戏剧。”